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评论选

下 册

安 徽 大 学

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评论选

下 册 目 录

关于《二月》的再评价·····陈骏涛、杨世伟、王信	(1)
殷夫的诗·····韩连仲、诸天寅	(22)
锋利、新鲜、夸张——试论张天翼的讽刺小说的 人物及其描写艺术·····吴福辉	(38)
“华威先生”的艺术形象·····乐黛云	(57)
叶紫的小说·····李健吾	(66)
八月的乡村·····李健吾	(79)
谈肖红作品记·····孙 犁	(94)
肖红论·····赵凤翔	(100)
一个青年诗人的“烙印”·····茅 盾	(112)
望舒的诗·····艾 青	(121)
试谈沈从文部分小说的思想倾向的复杂性·····董 易	(129)
时代的鼓手·····闻一多	(157)
论艾青诗的抒情结构·····骆寒超	(162)
看《上海屋檐下》·····袁水拍	(180)
怎样暴露黑暗——沙汀小说的诗意和喜剧性·····吴福辉	(189)
暴露抗战痼疾的讽刺艺术精品·····黄曼君	(202)

李季的艺术道路·····	孙绍振 (214)
论赵树理的创作·····	周 扬 (236)
褒贬毁誉之间·····	袁良骏 (250)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陈 涌 (263)
论张爱玲的小说·····	迅 雨 (282)
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杰作(喜见《围城》重版)·····	敏 泽 (300)

关于《二月》的再评价

陈骏涛 杨世伟 王 信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龙华秘密杀害了二十三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不屈的革命战士，其中就有“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同志。柔石是一位富有才华的青年革命作家，《二月》是他写于一九二九年的一部中篇小说，在思想上艺术上都较有特色。鲁迅为这部小说的出版付出了心血，他最早发现了这部小说的意义，并写了《柔石作〈二月〉小引》，向读者作了热情的介绍和推荐。这部小说历来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所注意，解放后出版的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关于柔石的评论文章，差不多都承认它是柔石的代表作，是现代文学史上应予肯定的一部文学作品。

但是，到了一九六四年年底，随着电影《早春二月》的批判，小说《二月》也被否定了。否定的理由，大致是这样几点：一、《二月》所写的只是“‘五四’以后旧中国的不少小说和电影中曾经流行过的三角恋爱”的“悲剧”，它没有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二、《二月》的主人公肖涧秋是一个“向右转”的知识分子的“典型”，或者说是一个“徘徊于革命斗争旋涡之外的小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另外一个主要人物陶岚也是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这样的人物，在当时“都已经是消极的力量，阻碍历史前进的力量”，只能揭露和鞭挞，而小说却对他们给予同情和歌颂；三、《二月》颂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它是“一曲人道主义的赞

歌”，所以这部小说的基本倾向是错误的；四、鲁迅当年曾批评了《二月》，柔石本人也否定了这部小说，等等。总之，根据这些评论文章的意见，《二月》除了文字描写技术上略有可取之处，其他方面是一无可取的，应予否定。

时过十四年，我们再来看看这些评论，不禁产生了一连串疑问：他们的观点究竟是不是正确的？《二月》究竟有什么思想意义？应该如何分析《二月》的主要人物？应该如何分析《二月》中所反映的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应该如何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二月》，还它以应有的历史地位？这些都是可以而且应该重新提出讨论的问题。

—

《二月》不是那种社会面展开得很广阔的作品，也没有直接描写重大的政治斗争。它只是通过中国社会一个普通小城镇的生活的一角，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几种不同类型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表现了他们的信仰、苦闷、希望和探索。

从作品所交待的一个情节——文嫂丈夫牺牲于攻打广东惠州战役，我们可以推知，故事的背景是一九二六年的大革命时期。

这个时期正是中国革命处于以“五卅”运动为起点的新的 高涨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促进之下，以中国共产党人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在基本统一了广东以后，正在准备出师北伐。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也在集结力量，打击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并阴谋篡夺革命果实。为中国共产党所倡导、为孙中山先生所支持的国共两党合作的局面虽然已经形成，但在统一战线内部却存在着尖锐复杂的斗争。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以及他们的知识分子，正在分化和重

新组合。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教育之下，毅然参加了革命，成为革命的中坚分子；另外一小部分则投靠国民党右派，成为他们的附庸和走卒；相当大部分则处于动摇不定的状态之中，或则对革命很不理解，另有自己的“理想”和“信仰”，或则虽有革命的要求，但却看不清革命的形势，犹疑徘徊，不知所向。

《二月》虽然并没有从重大的政治斗争中直接描写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不同道路，但仍然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犹疑徘徊、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

《二月》中出现的人物，除了文嫂和她的女儿采莲以外，其他几个差不多全是青年知识分子：肖涧秋、陶岚、陶慕侃、方谋、钱正兴。这五个人物大致又表现出几种不同的倾向。

钱正兴，这是“芙蓉镇里最富有的人家”的子弟，其父做过财政部次长，当属于官僚资产阶级。作品着重描写的是他作为纨绔子弟对待女性、对待爱情的庸俗、卑怯的心理；但从他兴致勃勃的高谈阔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也是一个西方资本主义的鼓吹者。这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作者对他的态度，显然是鞭打和批判的。

方谋和陶慕侃，他们各有自己的信仰：方谋相信三民主义，陶慕侃则相信教育救国主义。方谋所信仰的三民主义，看起来是接近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按说，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方谋只把这种信仰挂在口头上，并无任何实际的行动。而其为人处世，则采取随波逐流的态度。作者对他，虽然没有象对钱正兴那样的鞭打，但也没给予肯定的评价。

陶慕侃的教育救国主义，从中国当时的现实来看，本来是

一种空想。这种主张不过是改良主义的一种。因为它不可能改变社会的制度，所以在实践上无不处处碰壁。陶慕侃不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且还真诚地信仰着、真诚地实践着这种主张。作者是把作为比较正派、厚道的人物来描写的，肯定的态度似乎多一些，但对他的政治信仰——教育救国主义，却看不出有什么肯定的评价。

方谋和陶慕侃虽然表现出不同的信仰，但从基本的政治倾向来看，他们都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种：他们各有自己的“主义”，而对革命还不能理解或不愿去理解。

作为小说的主要的中心人物当然是肖涧秋和陶岚。从政治上看，他们与方谋、陶慕侃没有根本的区别，同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中间成分”，但思想倾向又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对现状非常不满，与旧的传统习惯也格格不入，他们对资本主义、三民主义、教育救国主义一概怀疑，而自己却没有建立起一种坚定的信仰。他们似乎渴望着一种奋斗，一种变革，却又是孤单软弱的；他们远离人民革命的洪流，并没有寻找到一条真正的革命道路。

当然，细致地分析起来，肖涧秋和陶岚还是很不相同的。肖涧秋的人生阅历比较丰富，六年来一直在寻找人生的道路而不可得；在政治上虽然没有建立起一种坚定的信仰，但却有着自己的独立见解。陶岚则是一个长期关在笼子里的鸟儿，还不知道外间的世界有多么广阔；她所向往和追求的，还是“五四”时代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向往和追求的东西：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作者对这两个人物，是怀着较深的同情的。但如果一定要说作者是把肖涧秋和陶岚作为歌颂对象（如有些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则又违背了作品的实际。诚然，肖涧秋和陶岚是小说的主要中心人物，但主要中心人物并不一定是作者所要

歌颂的对象，这是为古今中外的许多文学作品所证明了的事实。如果说，在小说里，作者有所歌颂的话，那就是还没有出过场的、在大革命中已牺牲了的文嫂的丈夫——李君。

《二月》就是通过这样几个各有主义、各有追求的知识分子形象的描写，从一个小的侧面反映了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动向。特别是通过肖涧秋这个人物形象的描写，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知识分子是投身于革命潮流之中，还是徘徊于革命潮流之外，抑或是逆革命潮流而动？

对肖涧秋，鲁迅曾有过精辟的分析：

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冈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唯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这从上述的两类人们看来，是都觉得诧异的。但我们书中的青年肖君，便正落在这境遇里。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①

鲁迅的意见之所以精辟，就在于他不是对肖涧秋这个人物作简单的肯定或简单的否定，而是采取具体分析的方法，发掘了这个人物心理的矛盾，分析了他的思想性格的两面性。并且指出，这是那种感染了时代的革命思潮而又未能投身革命洪流中的一种知识分子（“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特有的矛盾。显然，鲁迅对肖涧秋的评价是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因此，那种认为鲁迅是否定了肖涧秋的意见，是违背鲁迅的本意的。

肖涧秋出身寒苦，自幼就失去父母，依靠他的堂姐的抚养进了师范学校，但堂姐不久又去世了。他感到人生的孤寂，也对黑暗的现实深感不满。从师范学校毕业以后，他就象浮萍一

样到处飘泊，六年之中，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但还找不到一个安身之处。他与旧社会格格不入，但缺少斗争的勇气和力量，他极想有为，却又找不到出路。他感到人生的迷茫和悲哀，于是想在芙蓉镇这个“世外桃源”里寻找暂时的宁静。但芙蓉镇既不宁静，也不太平，仍然充满着种种的矛盾和斗争。在受到一些人的攻击和遭遇意外的变故（文嫂的死）之后，她终于觉得连芙蓉镇也难以安住了。于是，他再度出走，依然象两个月前那样，“孤零地徘徊在人间”。

象肖润秋这样的人物，当然不是那个时代的先进的知识分子，但也不是如有些评论所说，是什么“小资产阶级的右翼分子”、“向右转”的知识分子的“典型”。正确地说，他是一种“中间分子”，是那种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当中，徘徊中路、苦闷抑郁、不知所向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也有可能向左转。也有可能向右转。无疑，就世界观来说，肖润秋的确是个想依靠个人奋斗来寻求自己和社会出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从基本的政治态度来说，是没有理由认为他是“右翼分子”的。他对于参加北伐战争的老同学李君，是支持和同情的；而对于钱正兴的资本主义，方谋的三民主义，甚至于陶慕侃的教育救国主义，是格格不入的。他自己说他是个“没有主义的人”，而方谋却怀疑他是信仰共产主义的。方谋的怀疑当然没有充分的根据，但至少说明在方谋这种人的直感上，肖润秋那种对于现状的不满、对他们所信仰的主义的怀疑，是包含着左倾的色彩，而与他们并不同道。把肖润秋看成是“右翼分子”，在作品中是找不出根据的。

毛主席说，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接近的朋友”。那么，象肖润秋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的“中间分子”，即使有很大的思想弱点和局限，也应该是无产阶级争取和团结的对象，

把他们引入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洪流中来，并在斗争中帮助他们改造世界观。因此，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寻找革命道路，包括反映他们的苦闷彷徨的作品，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二月》就是属于这样的作品。

那么，《二月》的主要思想意义是在哪里呢？鲁迅的一段话是引人深思的，鲁迅说：

我从作者用了工妙的技术所写成的草稿上，看见了近代青年中这样的一种典型，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动，便写下了一些印象，算是序文。大概明敏的读者，所得必当更多于我，而且由读时所生的论异或同感，照见自己的姿态的罢？那实在是很有意义的。②

这就是说，《二月》的主要意义是起到一种照镜子作用。它通过几种知识分子思想倾向的描写，特别是通过肖涧秋企图逃避现实斗争、寻求宁静而不可得思想和境遇的描写，通过他的徘徊动摇，不知所向的精神状态的刻画，给同类的人们提供了一面镜子，由此而“照见自己的姿态”，以思考和选择自己的道路。

当然，《二月》有它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两点上：第一，对肖涧秋这个人物给予了过多的同情，甚至连他的弱点也给予同情。这是和作者柔石本身思想和境遇有关的。根据有关回忆材料，在大革命时期，柔石是有过与肖涧秋若干相类的苦闷和经历的。因此，可以说，《二月》多少带有自叙传的色彩，肖涧秋的形象，多少带有作者本人的影子。由于作者思想上的局限，就不能站在更高的水平上，对肖涧秋给予比较深刻的批判。第二，小说反映和提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出路问

题，但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并没有给知识分子指出一条明确的革命出路。这是当时的柔石所不可能做到的。柔石自己是在写出这部小说之后的一九三〇年，才选择了明确的革命道路，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随即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不屈的革命战士。

鲁迅对《二月》曾经有过口头的和文字的批评，但那是在肯定小说的前提下的批评。据回忆材料说，柔石本人是“非常悦服这种诚恳而具体的批评”的，认为“这种批评才是对作者有帮助的批评”。③鲁迅认为《二月》创造了象肖涧秋这样的青年的“典型”，“那实在是很有意义的”，这明明是在向读者介绍和推荐，不具任何偏见的人，一眼就能看出。然而，我们的某些批评者却把鲁迅的那些出于爱护的批评，作为他们完全否定这部小说的依据。这样的批评方法，实在是令人诧异的。

二

在评论《二月》的时候，如何评论小说中所表现出的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十四年前的有些评论对这个问题采取了简单否定的态度，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必须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对这个问题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让我们先来谈谈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是一个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它兴起于十四——十六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继承了这个传统。人道主义者提倡“人道”，以反对“神道”，提倡“人权”，以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解放”，以反对中世纪的“宗教桎梏”。这种思潮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中，曾经起过积极进步的作用，对科学和文学艺术

的发展，也有过非常有益的影响。在人道主义思想的鼓舞下，曾经产生了许多辉煌的文学作品。当然，人道主义的思想基础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它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就逐渐丧失了它的反封建的锋芒，而变成一种掩护资本主义罪恶、欺骗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谎言。在现代，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更利用人道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都是毋庸讳言的。然而，却不能因此否定某些思想家，文学艺术家身上某种人道主义的精神，特别是不能因此否定一些中外作品中所表现出人道主义的思想倾向。它们通常所表现的那种对在封建和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压迫者、被损害者的怜悯和同情，对压迫者和损人者的谴责和鄙视，如果不包含有反对革命的倾向的话，那么，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即使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也是不能一概予以否定的。

这是一个比较专门的问题，探讨这个问题，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我们主要想谈谈，在中国的民主革命阶段，这种人道主义的思想应作何评价。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一种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反帝反封建是这个革命的主要任务。作为这个革命的领导思想，当然只能是无产阶级思想，不能是别的什么思想。但是，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主要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一些思想，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也可以起一定的进步作用。这些思想大多还是被中国的先进分子从西方引进的。尤其在“五四”前后，凡是被西方资产阶级用来反封建的思想武器，差不多都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所接受，并根据反帝反封建斗争需要，对它们加以分析和运用。例如，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接受了进化论，另一位伟大旗手郭沫若则接受了泛神论，并且都在他们早期的思想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思想也是这样。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思想也为中国的参加民主革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所接受，并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起过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五四”以后，我国不少进步的文学作品表现了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其所以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原因就在这里：它不是用来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而是用来反帝反封建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五四”前后，各种思潮，各种主义，纷至沓来，此伏彼起，使当时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呈现极为复杂的状态。多数知识分子还分不清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他们欢呼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欢呼包括人道主义在内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五四”时代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战士郭沫若就曾说过，他在当时的思想，是处于一种“半觉醒状态”，“思想相当混乱，各种各样的见解都沾染了一些，但缺乏有机的统一。因而，有些话说得好象还不错，而有些话又却十分糊涂”。因此，在这位新诗运动伟大奠基者的诗歌中，既讴歌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也讴歌了资产阶级顶礼膜拜的偶像；他赞同列宁批判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的说教，又让列宁喊出了资产阶级流行的要求“人道”的口号。④

周扬同志曾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

“五四”新文化运动给我们带来了科学和民主，也带来了社会主义的新思潮。那时我们急迫地吸取一切从外国来的新知识，一时分不清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界限。尼采、克鲁泡

特金和马克思在当时几乎是同样吸引我们的。到后来我们才认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解放人类的唯一真理和武器。……那个时候，我们许多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不如说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个人主义的影响在我们身上长期不能摆脱。回想当年，个人主义曾经和“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等等的概念相联系，在我们反对封建压迫、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给予过我们鼓舞的力量。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的许多杰出作品经常描写个人和社会的冲突，愤世嫉俗，孤军奋斗和无政府式的反抗，这在我们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曾经热烈地欢迎易卜生；欣赏他那句“世上最孤立的人就是最有力量的”的名言。我们中间许多人就是经过个人奋斗走上革命道路，背着个人主义的包袱参加革命的。⑤

可见，“五四”以后的进步的知识分子，思想上菁芜并存，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即使在成为无产阶级战士以后，也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克服和改造过程。这种状况不仅存在于二十年代，甚至还延续到三十年代或四十年代，贯串于整个民主革命时期。

了解到以上的这种情况，至少可以使我们明白，象柔石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种落后甚至于反动的政治倾向的。柔石写作《二月》的时候固然接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但他也跟当时大部分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并没有摆脱包括人道主义在内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二月》就表现出人道主义对他的影响。

《二月》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倾向是通过肖涧秋表现出来

的。肖涧秋人道主义思想的主要表现是对革命遗孀文嫂的同情和救助。文嫂的丈夫是为革命牺牲的。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文嫂带着她的两个年幼的孩子，却得不到任何的抚恤和救助，从精神到生活都几乎濒临绝境。肖涧秋了解到文嫂的处境，对这一家孤儿寡妇产生了怜悯和同情。这不仅因为文嫂的丈夫是个革命者，是肖涧秋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候的同学；而且因为肖涧秋自幼就是个孤苦无依的人，在人间尝尽了孤独的辛酸，因此很容易对不幸而产生同情。对这种同情，是没有理由加以责难的。更不能象有些评论者那样，曲解为是一种“异性的吸引”，因为他既不符合作品的实际，也不符合我们阅读作品时的实际感受。

“五四”以后，不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常常由于自身的处境和社会的腐败，而萌发出不满现状、反抗现实的意识，同时也对劳动人民的苦难表现出某种同情。这种同情，尽管大多表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悲天悯人的意识，并没有认识到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理应成为社会的主人。然而，应当肯定，这种同情心，还是属于一种进步的意识。对于非劳动人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常常由于这种思想，使他们接近和了解被压迫的劳动人民，进而投身于革命运动。

还应该看到，在肖涧秋的思想性格中，虽然人道主义的色彩很浓，但他并不是一个人道主义思想理论的信仰者和鼓吹者，他只是接受着人道主义的思想影响。他讲不出自己有什么信仰和主义，事实上他也确实没有一种坚定的信仰和主义。他的思想状态是迷茫的、无所遵循的、而又在不断地探索着。应当看到这种复杂性，而不能不顾作品的实际，把肖涧秋当作人道主义者或人道主义的化身。

毫无疑问，人道主义是有很的局限性的。深受人道主义思想影响、同时又没有寻找到无产阶级思想武器的知识分子，

必然表现出更大的局限和弱点。这在《二月》故事的发展中，也得到真实的反映。肖涧秋既然不能用阶级的观点来看待文嫂一家的苦难遭遇，既然他的所作所为还没有触及黑暗的社会制度的本身，而仅凭个人的力量和善良的愿望来解救不幸的人们，结果必然要碰壁的。小说真实地反映了肖涧秋的这种悲剧。他尽管尽了最大的努力，最后甚至决心违背自己的意愿把文嫂娶来，但这一切都没有改变文嫂的悲剧的命运，文嫂还是自杀了。文嫂为什么自杀呢？一方面是由于感到生活的绝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怕因他而连累了肖涧秋，破坏了肖涧秋与陶岚的爱情。这一点，肖涧秋是认识到的，他在离开芙蓉镇给陶慕侃的信中就说，文嫂的死，是“她为爱我和你底妹妹（按指陶岚）而出此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肖涧秋对文嫂的同情和救助，不仅没有救文嫂出水火，反而是加剧了文嫂的死亡。肖涧秋是曾经预感到他对文嫂一家所作的努力，最后可能要失败的；明知道要失败，却还要这样做去，这正是肖涧秋这类没有找到正确理想和出路、精神苦闷空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点，是他的性格的悲剧。小说细致而生动地描写了这一切。作者当时的思想也许还比较朦胧，但是，他通过肖涧秋救助文嫂而促成的一场悲剧（文嫂的死，肖涧秋终因意想不到的打击而再度漂泊），至少在客观上是显示了人道主义的失败。因此，那种认为《二月》是“一曲人道主义的赞歌”的看法，显然又远远违背了作品的实际。

当然，无论从作品的实际来看，还是从作者当时的思想来看，作者对人道主义思想，都还未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因此，作品虽然在客观上显示了肖涧秋人道主义的失败，但可以看出，作者柔石是以无限哀婉和同情的态度来描写的，这正反映出作者当时思想上的矛盾和局

限，事实上也正反映出人道主义和人性论思想的影响，给作者带来的矛盾和局限。

鲁迅曾经回忆道：

看他旧作品，都很有悲观的气息，但实际上并不然，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⑥

这种好心，正是柔石受到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思想影响的缘故。既然柔石不能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一切人和事，因此，他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种种残酷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就常常感到迷惑不解了。由此可见，人道主义尽管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一个真正要求革命、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要在革命的征途上永往直前，那就一定要彻底摆脱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种种影响的。

下面我们来说说个性解放。

如前所述：“个性解放”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追求的目标之一，它同样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口号。这个口号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中曾经起过积极进步的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求冲破一切封建宗法制度的束缚。因此，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口号，在当时为很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和鼓吹，并在反封建的斗争中，给过他们鼓舞的力量。

还应该看到，这种个性解放的要求，不仅在“五四”时期有进步作用，事实上还是贯穿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